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四卷

李　怡　主编

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话的分野

彭继媛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四卷

李　怡　主编

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话的分野

彭继媛　著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3YJA751038）成果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第4卷，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话的分野 / 李怡主编；彭继媛著．—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543-0209-5

Ⅰ.①现… Ⅱ.①李… ②彭… Ⅲ.①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②诗歌史—中国—现代 Ⅳ.①I209.6 ②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5315号

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话的分野

Xixue Dongjian yu Zhongguo Xinjiuti Shihua de Fenye

策划编辑 张灵舒
责任编辑 黄初镇 张灵舒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杨亚丽
责任校对 张名娟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510665）
网址：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020）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穗彩印务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19号B幢）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80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209-5 / I·226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李　怡

“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名作欣赏》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名作欣赏》，一个似乎意味着文学普及的名字，在80年代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大众普及”，而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学者自我训练的起点，在当时，数量众多的活跃一时的文学研究者都与《名作欣赏》结缘，或者贡献自己的新锐见地，或者长篇连载，甚至就是在此发表处女之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形势”陡变。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逾越了“文学”的边界，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跨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政治学、思想史、社会学的一种材料。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更在中国流行开来。“文化研究”最早产生于50年代的英国，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 Williams）与霍加特（R. Hoggart）。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从8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迅速发展，至今，它几乎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

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的现实是，“文化研究热”已经以汹涌澎湃之势在中国高校与学术机构中蔓延开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学位论文：在文学的学科标志下尽力展开的却是关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广泛讨论，文学现象不过只是其中的部分材料而已。

西方的解构主义也以“文学性扩张”的判断给予这样的思路莫大的鼓励。乔纳森·卡勒告诉我们：“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列德·洛维一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①

文学内容的日渐稀少的确令我们对“文学”的曾经的痴迷遭逢尴尬，越来越多的“文学之外”的知识领域的入侵让我们对自己的学科归属不无焦虑，甚至“绝望”：

> 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关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
>
> 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
>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①

就是我自己，也因为文学史叙述一再为抽象的理论所占据而充满困惑：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我曾经试图提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②

当然，所谓学科的“规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共识，我们也无法断定跨越性的研究在未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新的学科，形成新的学术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跨出了文学，试图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领域里寻求伸展的时候，也同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我们怎样将“文学”作为材料，最终都必须在其他学科中取得真正的发现，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跳板，我们最后要达到的“高度”必须符合其他学科的水准。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但30年代的中国是不是就如我们这些文学材料中所描述的那样呢，“文学”自己就不足够了，能够检验我们结论的一定是历史学的相关“规范”，我们也可以通过延安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进入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领域，可供我们比照分析的主要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一系列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有的知识显然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在突破文学边界，进入“文学之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尴尬，例如新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希望将延安——十七年——“文革”的文学历程肯定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文化硕果，殊不知，不仅其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难以认同，就

① 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南方文坛》2003年1期。

② 李怡：《文学史是什么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

是近现代史学界与中共党史的学者也颇不以为然。

跳出“文学”的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表述问题，看起来是超逸了文学，其实骨子里却依然动用着文学的想象，所以就无法真正回答“文学之外”的问题。这样的尴尬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那么，回到文学自身，是不是就真的可行？真的理所当然，真的理直气壮呢？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目睹了这一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拨乱反正”之功，也见识了跳出“文学”之后的种种尴尬和困惑，但是，平心而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更文学”其实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既美丽，更正义，因为我们曾经的文化专制让一切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无可选择地纳入了政治表态的范畴，在这时，重申“文学”的价值，其理由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恢复人基本的言论权利与自由思维的权利。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向度上，我坚持高度肯定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并且主张继续研究和光大这一伦理正义的可能，对于90年代就此的诸多批评都不予认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当时，对于伦理正义的强烈渴求的确远远超过了对于口号内涵与学理的细致分析，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真正的“文学本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在未经严格的学术追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文学本身”视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赋予它某种本质性的猜想，比如思想的现代性，语言的白话，等等。

正是这样未经追问的模糊给了90年代的质疑以机会。当然，这不是说在今天，所有自“文学”逃逸的学人都出自同样的思想基础，但至少其中相当多的人们是逐渐感受到了“文学”的不稳定、不可靠，从而企图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捕捉某种真切的事实。比如，我们曾经说，追求“现代”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涵，但问题在于，深入的考察却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却千差万别，胡适有胡适的现代观，陈独秀有陈独秀的现代观，一向质疑的鲁迅更与他们迥然有异，更不要说左翼、右翼与延安道路了；白话呢？虽然可以解释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是后来的考证也逐渐证明，新文学并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现实，何况新文学作家本人也有放下白话，重操文言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理解，就

是类似的困惑吸引我们的研究者开始迈出（或者说“解构”）了“文学”的大门，企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寻觅现代中国人的切实追求，而“文学”逐渐降低为社会文化整体面貌的组成元素之一。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就20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生长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①

在今天，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历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作家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决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而且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与历史的流变繁复也使得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单纯，介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在这个时候，抽象、笼统地谈论“回到文学本身”显然也是空虚的，无的放矢的。

既不便抽象地诉求“回到文学本身”，又不能因为超逸“文学”而陷落到四不像的尴尬，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在我看来，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就是：继续回到文学，但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纯文学”，而是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信息的“大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未来，也许就在“回到大文学本身”。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

---

①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回到大文学本身，最终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回到大文学本身，我们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想象、知识社会学的考辨与感悟体验式的批评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发展，曾经以对理性规范的强化来排除文学的感性想象，以知识论的建构质疑体验论的缺陷，其实，即便是在“文学之外”的最抽象的理性思辨之中，我们也难以摆脱骨子里的文学想象，反倒是不能自我承认的这种“想象”干扰了本该“不必想象”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与其让想象与感性如此扭曲地存在，不如为他们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力主回到以作品阐释为旨归的“大文学”，那么保留和发挥我们的感性想象也就是“文学”的题中之义；与此同时，跨出“文学”的“小”，纳入“文学之外”的“大”，也让其他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有了一席之地，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有机会进入文学研究，弥补我们既往学术的种种不足。

目 录

引论：中国现代旧体诗话与新体诗话的概念辨析 / 001

第一编 西学东渐中新旧体诗话批评主体的现代性

第一章 中国新旧体诗话作家社会角色的变化 / 015

第二章 新旧体诗话作家知识结构的变化 / 023

第三章 留学背景与旧体诗话作者的知识结构转变 / 030

第二编 西学东渐中的旧体诗话传统性与现代性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中的同光派诗话 / 039

一、同光派诗学传承与嬗变 /041
二、新文学诗学观念中的“同光派”资源 /055

第二章 西学东渐中的南社诗话 / 064

一、南社诗话唐宋诗学之争 /064
二、南社诗话的革命倾向 /077
三、西学东渐中的其他旧体诗话 /087

第三章　西学东渐中旧体诗话的现代嬗变 / 107

一、旧体诗话批评对象的变化 / 108
二、旧体诗话批评内容的现代质素 / 170
三、旧体诗话批评话语的现代性 / 213
四、旧体诗话批评思维的现代性 / 243

第三编　西学东渐中新体诗话的现代性与传统性

第一章　新体诗话的萌生与发展 / 259

一、民国时期的新体诗话 / 259
二、共和国时期的新体诗话 / 264

第二章　新体诗话与外国诗学的关系 / 269

一、新体诗话批评对象的西化倾向 / 270
二、新体诗话诗论与外国诗学的相通 / 285
三、新体诗话中西诗学的比较与融合 / 295
四、新体诗话中的译诗主张 / 301

第三章　新体诗话在意境理论上对旧体诗话的承继 / 312

一、旧体诗话中传统意境理论的演变 / 314
二、新体诗话现代意境理论的传统承继 / 321

结语：诗话作为现代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 / 344

主要参考文献 / 349

后　记 / 36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引论：中国现代旧体诗话与新体诗话的概念辨析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诗话自北宋时代崛起以来，一直以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专著形式而跻身于文苑诗坛，作家云蒸，著述繁复，众彩纷呈，流布世代，显示出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千余年来不断地流变和演进，诗话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论诗传统，这正如刘德重、张寅彭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诗话是我国古代诗学著作所特有的形态，它是一种以笔记体为基本形式，具有理论批评性质、记事杂录性质或讲说诗法性质的诗学著作。”[①]即诗话作为传统诗学的一种著述形式，它的存在是与传统旧体诗的写作和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走过宋的崛起、金元的衰落、明代的复兴、清代的鼎盛，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诗话发生了历史性的创新和变革，出现了旧体诗话和新体诗话并存的局面。这正如蔡镇楚在其著作中也指出，“在中国诗话史上，诗话的语言形式和创作规范，一般以‘五四’时期为界限。五四以前的历代诗话，都是文言体式，即使是晚清诗话中的‘新派诗话’也不例外；而‘五四’之后，诗话创作的语言形式有文言，也有白话，而以白话为主。这种语言形式的变化，也正是诗话的历史性转变的新的起点。”[②]可见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摧枯拉腐之势猛烈地冲击着传统文化的古堡，开创了诗话创作新局面的起点。他在其论著中还具体指出“现代诗话”是指以普通话为语言形式又含有新内容的“新体诗话”，“旧体诗话”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仍然以文言为语言形式、以复古崇古为创作旨归的诗话。[③]刘德重、张寅彭持以类似的观点：“从我国文学发展史和

① 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修订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 蔡镇楚：《诗话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3页。

③ 以上新旧诗话的区分详见蔡镇楚：《诗话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4—165页。

文学批评发展史来看，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的新文学运动，将我国文学分成了古代（含近代）文学和现代（含当代）文学两个时期。在这以后，白话新诗已逐渐取代了文言旧体诗。尽管旧体诗的写作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在现代文坛上毕竟已不占重要地位。现代诗论与传统诗论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是两个系统。因此今人撰写的诗话，可以根据其研究对象和表达方式分属两个系统。例如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钱仲联先生的《梦苕庵诗话》、《清诗纪事》，都是以古代旧体诗为研究对象，在表述上也大体采用文言及传统方式，它们与古代诗话的统绪是一脉相承的。……至于那些以现代白话新诗为谈论对象的新诗话，只是借用传统诗话之名，已无传统诗话之实，它们实际上应当属于现代诗论，而不应再纳入传统诗话的范畴。”[①]张寅彭也说：“民国诗学著作，例有说旧体诗与说新诗之别，当分为二目。本目所收，以说旧体诗为限。此一类著作，得承晚清旧体诗创作大复盛之势，又隐得其时西学大炽背景之助，故其说或被指为保守，实于旧体诗之总结，已颇有新义可采。至于说新诗者，其对象、旨趣皆与之判然大别，如任钧《新诗话》专说新诗，朱光潜《诗论》兼说新、旧诗乃至西诗等，故宜分别观之。”[②]在此前辈学者对今之诗话分属的体系和新旧体诗话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和辨析。即20世纪的中国诗话分属两个体系，一类为以文言写作、以言说旧体诗为主的旧体诗话，可视为清诗话之延续；另一类为用白话文书写以言说新诗为主兼谈西诗、旧体诗的新体诗话。有学者将20世纪新体诗话和旧体诗话统称为“现代诗话”。[③]为了与历代诗话称谓上的区别以及20世纪新旧体所处的现代语境，本文分别对20世纪新旧体诗话分别称之为“现代新体诗话”、“现代旧体诗话”。

考订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列举的近两百条现代诗话书目（其中有一部分旧体诗话）[④]、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所附1912—1949

① 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修订本），第9—10页。

② 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③ 参阅复旦大学2007年汤保华硕士学位论文《现代诗话研究》。

④ 需要指出的是蔡镇楚在《石竹山房诗话论稿》中辑20世纪诗话著作或其尚非著作或存佚不明仅各家著录的诗话目录近两百条，其中既辑以言说旧体诗为主的由云龙《定庵诗话》、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屈向邦《粤东诗话》等多部诗话，也辑以言说新诗、旧诗乃至西诗的朱光潜《诗论》与专说新诗的任钧《新诗话》，戴望舒《望舒诗论》，等等，统称之“现代诗话”。这一安排，似乎与他在《诗话学》中对“新体诗话”、“旧体诗话”界定有些出入。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22—445页。

一百六十六条以言说旧体诗的诗学著作书目以及蒋寅《清诗话考》[①]附录的45条旧体诗话书目，加之近代以来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现代旧体诗话的创作数量仍是非常庞大的。李德强在其论文《中国近代报刊诗话的流变》中说："近代随着报刊文学的兴起，像诗话、文话、小说话、剧话等大量出现于报中。就诗话的创作和刊载而言，它的数量更是惊人。自1905年至1919年14年间，近代报刊共刊载出二百九十九种诗话作品"。[②]不仅如此，他还指出"近代报刊诗话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其密度并不亚于清诗话"。[③]而据笔者的收辑，粗略估计目前自1912年至1949年37年间散见于各报纸杂志的报刊旧体诗话也可高达400多种。具体有《拜经楼诗话》、《半山诗话》、《残月晓风之楼诗话》、《苍云阁诗话》、《春池馆诗话》、《春暖堂诗话》、《解颐诗话》、《寸楼诗话》、《蹉跎室诗话》、《单云阁诗话》、《读书斋诗话》、《佛教诗话》、《非战诗话》、《高咏楼诗话》、《个影庐诗话》、《耕云草堂诗话》、《合肥诗话》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蔡镇楚在其论著《中国诗话史》（修订本）[④]中将夏敬观《唐诗说》，施蛰存《唐诗百话》，苕溪生《闺秀诗话》，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梁乙真《民族英雄诗话》，胡山源《幽默诗话》，彭子兰《湘湄诗话》，龙汇川《汇川诗话》，金燕《香奁诗话》，朱辛彝《双溪诗话》，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钱钟书《谈艺录》，等等，诗话界定其为新体诗话，但这些诗话从体例、言说方式、卷帙分类与传统诗话并无大异，基本上承接了传统诗话的批评形式和批评文体。因此本书仍将其纳入了现代旧体诗话的研究范畴。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谈艺录》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上难以逾越的顶峰。[⑤]其现代性是有目共睹的。但《谈艺录》用的是诗话词话的方式，连书名也是采用明代徐祯卿诗话《谈艺录》的

① 蒋寅：《清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51—690页。

② 李德强：《中国近代报刊诗话的流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③ 同上。

④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修订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90—391页。

⑤ 李洲良：《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书名，其著作中仍能较为清晰地感受到中国文论的话语言说方式，因此本书将钱钟书《谈艺录》纳入了现代旧体诗话的论说范畴。数量如此丰厚的现代旧体诗话，尤其是1919年之后的旧体诗话却多年来散藏于全国各地，鲜有人关注。笔者虽然曾经奔波于国内一些大图书馆之间，抄写拍照，查漏补缺，得到了一些比较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一时之间也确实难以收集齐备，因此本书论述所依托的资料未能总揽全貌，不能不抱挂一漏万之憾。应该说20世纪现代旧体诗话承接着清代诗话的余绪保持着足够的勇气韧性地存在着，直到1948年具备了很明显现代特征的旧体诗话的顶峰之作钱钟书《谈艺录》的出现才慢慢走向衰微。共和国成立之后还有侯传勋《意园诗话》[①]、陈声聪《兼于阁诗话》[②]等少量的旧体诗话。

相对于现代旧体诗话难逃日趋衰落的宿命，具有新形势和新内容的现代“新体诗话”，不仅打破了旧体诗话的统一天下，而且最终取代了旧体诗话的历史地位。新体诗话仍可沿用传统诗话体制分类的方法大致分为“以诗论事”、“以诗论辞”两大类别。民国时期[③]延续了古代诗话“论诗及事”随笔闲谈形式的诗话有关露《大众诗话》，一行《鲁迅诗话》，高疆《今人诗话》，锡金《鲁迅诗话》，忙蜂《忙蜂室诗话》，朱维之《赞美诗话》，岂明《姑恶诗话》，静闻《鼓楼诗话》，八仙《闺媛诗话》，时人《扑克诗话》，李湘萍《丘八诗话》，重甫（辑）《僧诗话（一）》，黄声远《抗战诗话》，正之《诗话》，名贤《诗话》，章泽英《诗话》，路易士《诗话钞》，斯尔螽《书简诗话》，白虹《喷饭诗话》，郭绍虞《照隅室诗话》，徐志摩《杂记》，王季思《岳坟诗话》，汪蔚云《读诗杂记——“新诗”诗话》，钱畊莘《严州永兴客店题壁诗话》，饶蒙侃《新诗话》，德征《新诗话》，天婴《新诗话》，今虚《新诗话》，方敬《新诗话》，追灵《新年诗话及其他》，苑苑《新婚诗话》，耿耿《舞场诗话》，任钧《新诗话》，朱自清《新诗杂话》，等等，数十种诗话。任钧曾说“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笔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

① 刊于《建设》1960年第8卷第10期。

② 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直排铅印本，上海：上海出版社，1985年。

③ 本书根据“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20世纪大体分为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因而诗话也可大体分为民国时期诗话和共和国时期诗话。

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①]他的《新诗话》随性漫谈的写法是很突出的。朱自清《新诗杂话》（1947）序言中也说：“我就用《新诗杂话》作全书的名字，另外给各篇分别题名。我们的‘诗话’向来是信笔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琐琐屑屑的，成系统的极少。本书里虽然每篇可以自成一单元，但就全书而论，也不是系统的著作。因为原来只打算写一些随笔。自己读到的新诗究竟少，判断力也不敢自信，只能这么零碎的写一些。所以便用了‘诗话’的名字，将这本小书称为《新诗杂话》。不过到了按着各篇的分题编排目录时，却看出来这十五节新诗话也还可以归未几类，不至于彼此各不相干。”[②]朱自清《新诗杂话》同样延续了传统诗话随性漫谈的写法。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新体诗话不仅形式上有着很明显传统诗话的特征，而且题名大多明确标示为“诗话”。而以下一些新体诗话虽然不用“诗话”名称，但遗留了传统诗话对话、片段、诗味等特征，如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不少论文如《谈诗》、《论诗》、《论画》等文章在形式上非常自由洒脱，很接近传统文论的评点诗话，在片段式、感悟式的结构中阐释了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现象，继承了古代诗话的形式，有灵活简洁之长处，无呆板冗长之弊端。戴望舒的《诗论》无疑是直觉感悟式的，无论是思想还是表达方式，他都接续了传统感悟式诗论的传统。他没有预先给出一个“诗”的定义，然后围绕它分门别类，条分缕析。而是不厌其烦地进行现象描述，用打比方的方式迂回说明，力图让别人去领悟那没有被他言说出来的“诗”是什么。不仅戴望舒《望舒诗论》、《诗论零札》[③]有传统诗话的特征，艾青《诗论》也是如此，“《诗论》采用生动的类概念，随处格言隽语，定位灵活，含论于象，诗的气质很浓，既是中国风格，又有现代色彩；既是简洁隽永的古代诗话的继承，更是‘以资闲谈’的古代诗话的大飞跃；既是诗论，又是诗一般的理论。”[④]由此可见，艾青《诗论》虽形式上零散独立，有着诗话的特征，但其对新诗创作的思考所表现出的现代品格却又是诸多新体诗话所难以企及的。而有的新体诗话

① 任钧：《诗论》抗战版序，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

② 朱自清：《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页。

③ “戴望舒《诗论零札》采用的也是诗话的这种文体，艾青的文体显然直接受到了戴望舒的影响”。吕进、岩佐昌暲：《中国与日本：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与今天》，《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④ 吕进、岩佐昌暲：《中国与日本：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与今天》，《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之“话”的故事成分逐渐消失，一改传统诗话“闲谈”的特点，也不再仅停留在对诗歌本事的阐说，而重视对诗歌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如胡怀琛《诗歌学ABC》，傅东华《诗歌原理ABC》，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徐敬修《诗学常识》，谢无量《诗学指南》，洪为法《绝句论》，刘文蔚《诗学含英》，孙俍工《诗底原理》，范况《中国诗学通论》，朱光潜《诗论》，刘圣旦《诗学发凡》，杨启高《唐代诗学》，李广田《诗的艺术》，蒋伯潜《诗论》，等等，大量具有明显现代性特征的诗学论著，尤其是朱光潜《诗论》（1948）是中国现代文论史上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堪称“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①]而某些现代新体诗话明确显示出西方批评观念及批评文体对其的影响，例如杨鸿烈就曾宣称他的《中国诗学大纲》的宗旨就是要“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②]又如江恒源在《中国诗学大纲》中关于诗学问题的思考没有采用传统的诗话形式，而是借鉴了西方诗学的文体形式，全书分为“通论”、“诗的定义”、“诗的起源”、“诗的分类”、“诗的组合原素”、“诗的作法”、“诗的功能”、“诗的演进”和“结论”九个部分，这种章节和篇目的创设在文体形式上已经十分现代了。而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如《新诗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论文虽算不上意义严格的现代新体诗话，[③]但为了显示“诗话”这种传统诗学批评方式在现代语境中的独到思虑和发展方向，本书仍将其纳入到了现代新体诗话的范围。共和国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诗话曾经遭受了较长时间的冷落，仅有少量的新体诗话如李季（1922—1980）《兰州诗话》（原刊《红旗手》，1959年第1期到第7期），闻山（1927—2011）《新诗话》（载《诗刊》，1963年十月号，1964年十一、十二月号），等等。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白话文为语言形式的现代新体诗话才大量出现，仅明确命名为“诗话”的大致就有《鲁迅诗话》、《沫若诗话》、《臧克家诗话》、《流沙河诗话》、《现代诗话》、《楚天诗话》、《中外诗话》、《窑台诗话》、《西湖诗话》、《文谈

① 李黎：《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读朱光潜先生的〈诗论〉》，《读书》1986年第8期。

② 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

③ 汤保华：《现代诗话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47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